

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
无封靡于尔邦，维王其崇之。
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无竟维人，四方其训之。
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二十世纪初期的前后几十年，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出人意外的急剧变化。特别是 1911 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社会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的传统政治。这使中国的普通民众第一次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能够自主地把握生活的机会。

民众主体意识的成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和各种社会情境因素的配合。但是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却迫使人们被动地承受着由于自己的不成熟而引起的背离状况。

文化心理与 中国社会主体意识

邵明 著

文化心理与 中国社会主体意识

邵明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曹 春 江小夏

装帧设计：木 辛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心理与中国社会主体意识 / 邵明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2

ISBN 978-7-01-017083-1

I. ①文… II. ①邵… III. ①文化心理学-研究-中国 IV. ①G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1723 号

文化心理与中国社会主体意识

WENHUA XINLI YU ZHONGGUO SHEHUI ZHUTI YISHI

邵 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5

字数：330 千字

ISBN 978-7-01-017083-1 定价：6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第一章 文化反省与主体意识	1
第一节 观念冲突和文化批判	3
第二节 个体意识的觉醒	8
第三节 对权威理念的沉迷	17
第四节 文化反省与主体意识	45
第二章 论个体的主体意识	48
第一节 人的主体意识及其经验性质	48
第二节 个体的主体意识及其发展	54
第三章 社会主体意识与中国文化的发端	108
第一节 论社会主体意识	109
第二节 陶器时代：自我意识的灵光初现	116
第三节 《诗经》：主体意识的心灵呼唤	131
第四节 中国社会主体意识的萌芽	160

第四章 宗教意识：早期中国社会的意义之源	162
第一节 统治意识的出现	163
第二节 替代意识：“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178
第三节 社会权力结构与中国社会的主体意识	254
第五章 德性观念与统治意识的重建	271
第一节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273
第二节 重建统治意识的社会政治背景	313
第三节 德性观念：新的意义之源	334
第六章 拔剑四顾心茫然	384
参考文献	390
后 记	394

第一章 文化反省与主体意识

烈文辟公，锡兹祉福。

惠我无疆，子孙保之。

无封靡于尔邦，维王其崇之。

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

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

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

於乎前王不忘！

——《诗经·周颂清庙之什·烈文》

20 世纪初期的前后几十年，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急剧变化。特别是 1911 年辛亥革命在推翻了大清王朝 268 年统治的同时，也结束了中国社会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的传统政治。这使中国的普通民众第一次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能够自主地把握生活的机会。只是人们被自上而下的专制皇权笼罩得时间过久，一时之间似乎还不能完全适应过来。

民众主体意识的成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和各種社会情境因素的配合。

但是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却迫使人们被动地承受着由于自己的不成熟而引起的悖理状况。例如，早在 19 世纪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人们就已经开始逐步意识到西方在科学技术上的先进（“船坚炮利”）远不是中国所能相比的，于是进行了三十多年“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语）的洋务运动（1861—1895）。洋务运动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结束，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和谭嗣同（1865—1898）等人在 1898 年又发动了戊戌变法，力图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和法律等等方面较全面地向西方学习，甚至尝试将传统的君主专制改变为君主立宪体制。可惜戊戌变法仅仅持续了 103 天就以失败告终。在经过诸多曲折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对传统政治抱任何希望，而是直接诉诸暴力革命的方式。尽管如此，1911 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可是并不能因此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中国传统的社会状况，人们似乎还需要更深入、更广泛的观念更新和社会变革。于是，自 1915 年《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创办起，陈独秀（1879—1942）、鲁迅（1881—1936）、蔡元培（1868—1940）和胡适（1891—1962）等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大力提倡“民主”和“科学”，强烈反对君主专制和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和传统礼教。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在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中达到高潮，并一直持续到 1923 年的科玄论战和 1935 年的文化论战。同时，各种社会运动也遍及中国民众生活的几乎每个角落，如文学革命、平民教育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或职业教育运动等等，都对当时的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些运动固然对人们主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正面、积极的作用。然而严酷的现实状况又不断挤压着人们的思想空间，使人们难以真正地把握自己的生活，因为一方面是战乱频繁，如辛亥革命之后的北洋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日本侵华战争和国共内战等等；另一方面是经济状况也混乱不堪，

大多数人尚处于贫困状态，那些地方军阀和金融寡头不仅对农业，还对刚刚兴起的民族工商业造成了严重破坏，使其始终处于步履维艰之中。这些糟糕的社会状况加上当时极度腐败的政治现实，使人们难免产生失望和沮丧情绪。

第一节 观念冲突和文化批判

仅仅推翻君主专制政权并不能使人们把握生活的能力一下子成熟起来。实际上，中国社会基于统治意识的权力结构在三千年以来已经对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产生了太深的影响，几乎固化了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因此，即使是那些崇尚自由民主和科学理性的新派知识分子，在思想深处似乎也一时难以彻底地摆脱传统惯性的左右和束缚，仍然盲目地崇尚某种规范而不宽容地排斥着其他的一切。例如，胡适在 1923 年时说：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①

于是他以科学（如进化论和实验主义）为武器，极力批判中国一切传统的东西，提出要“全盘西化”，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

①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载于欧阳哲生编：《胡适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88 页。

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①

鲁迅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和《祝福》等小说中揭露了传统礼教“吃人”的本性。例如在《狂人日记》中他借“狂人”之口说道：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四千年来时吃人的地方，现在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②

这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批判，可以说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而另一方面，鲁迅对西方文化的一切却推崇备至。他告诫青年人只看外国的书，不必看中国书，因为：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③

被胡适称赞为“只手打翻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1872—1949）激烈抨击传统“吃人的礼教”，认为“儒家以孝悌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

①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自序》，载于欧阳哲生编：《胡适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09页。

② 鲁迅：《狂人日记》，《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后收录鲁迅杂文集《呐喊》。

③ 鲁迅：《青年必读书》，载于《京报副刊》，1925年2月21日。后收录鲁迅杂文集《华盖集》。

结之根干”^①。然而他在勇于同自己父亲进行“家庭革命”的同时，却十分专横地对待自己的两个女儿，尽显其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以及新旧观念的内在冲突。

当然，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际，出现这些状况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说，他们看待新观念（如科学、民主和自由等等）的方式，与原来人们看待旧观念（如三纲五常之类）的方式，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虔诚信奉一类观念而全力攻击另一类观念。实际上，观念之间的冲突是很容易形成的，任何思想性观念都具有一定的批判能力，都是在自身的主张中排斥着其他主张。如果执着于以某一种观念批判其他观念，那么，这恐怕并不能使人们从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仍然会受某种观念的奴役，特别是当这种观念看起来很“美”，很新潮时尚，或者很有权威很有力量，简直就是“真理”本身的时候。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各种新思想在中国被大力提倡之后，很快就会出现强烈反对的声音。例如，梁启超、梁漱溟（1893—1988）、熊十力（1885—1968）、杜亚泉（1873—1933）、张君勱（1887—1969）等人在全盘西化论者的刺激下，就宁愿坚持中国固有文化的优越性。梁启超在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时就感叹“文明破产”，说“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②，认为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拯救世界。于是他号召青年人：

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
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们呢！^③

① 吴虞：《吴虞文录》，黄山书社 2008 年版，第 4 页。

②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载于葛懋春、蒋俊编：《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62 页。

③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载于葛懋春、蒋俊编：《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06 页。

梁漱溟把中国、西方和印度文化分为各有特点的三类，认为中国文化比较而言是最优秀的，因而将来的世界文化也必将是中国文化：

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人类生活只有三大根本态度，由三大根本态度演为各别不同的三大系文化，世界的三大系文化实出于此。^①

他认为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注重人际之间的伦理关系，采取调和的人生态度，以及谨慎的理性精神；周公和孔子就是中国文化最杰出的代表：

真正中国的人生之开辟一定前乎孔子，而周公当为其中最有力之成功者。周公并没有多少道理给人——他给人以整个人生。他使你无所得而畅快，不是使你有所得而满足；他使你忘物忘我忘一切，不使你分别物我而逐求。怎样能有这大本领？这就在他的“礼乐”。自非礼乐，谁能以道理扭转得那古代社会的人生！自非礼乐，谁能以道理替换得那宗教！中国文化之精英，第一是周公礼乐，其次乃是孔子道理。^②

熊十力对人们放弃传统学术痛心疾首。他认为：

中国数千年来，高深之文化，根底具在六经。清末以来，朝野日以模仿西洋为务。举西洋所有之新思潮，（学术上之各派哲学与文学，

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于陈来编：《梁漱溟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1 页。

② 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载于陈来编：《梁漱溟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00 页。

政治社会方面，自民主至于共产等思潮，无不袭来。）好制度，（政制，自总统制，内阁制，乃至委员制，三十年来无不袭而行之。其效如何，吾不忍言。）好名词，（国人惯用极好听之名词，而所行适得其反。）无不尽量输入。学子且高呼完全西化，线装书投厕所之论，倡自海内闻人，腾之著名杂志。（经籍即线装书。）西化气焰极高，而政教乃日坏。^①

在他看来，面对糜烂的现实，人们正应该返回中国传统思想才有可能加以真正地解决：

当今上下一心，果能实体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诸义而力行之，又何忧乎国难？圣训洋洋，无一语不切实用，奈何以迂谈视之？^②

杜亚泉把西方学说的输入比喻为“直与猩红热、梅毒等之输入无异”，而“吾固有文明之特长，即在于统整。且经数千年之久，未受若何之摧毁，已示世人以文明统整之可以成功。今后果能融合西洋思想以统整世界之文明，则非特吾人之自身得赖以救济，全世界救济亦在于是。”^③

张君勱根据法国哲学家倭铿（Rudolf Eucken, 1846—1926）在其著作《大思想家的人生观》中所主张的生命哲学理论，认为：

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惟

① 熊十力：《读经示要》，载于景海峰编：《熊十力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页。

② 熊十力：《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载于景海峰编：《熊十力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2页。

③ 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载于《东方杂志》第15卷第10号，1918年10月。

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盖人生观，既无客观标准，故惟有返求之于己。^①

他说的“返求之于己”，也就是指要靠宋明心学的内心修养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

对传统习俗和观念的愤恨会导致有些人无原则地崇拜外来的习俗和观念，而这又反过来刺激一些人采取完全对立的主张。当时各种报纸杂志或讲演座谈上的介绍或讨论，夹杂着过多的情绪性宣泄。肤浅的理解加上偏激的言辞，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又造成许多人宁愿走向相反的理论选择。他们看起来都很有自己的道理，然而这种观念的冲突却往往显得非理性的成分居多，也不是一种谨慎的态度。

尽管如此，在情绪化的思想交锋中，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清醒地认识到了个体意识自觉对重新建立现代中国社会生活而言的重要意义。

第二节 个体意识的觉醒

没有民众主体意识的成熟，这个社会的精神状态就总是难免茫然或压抑，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也将始终反复于统治意识的清醒或昏庸，无法摆脱思想上受到的束缚和限制，因而普遍地呈现出一种奴役和被奴役的观念形态。

梁启超是较早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人。1902年他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

^① 张君勱：《人生观》，《清华周刊》第272期，1923年2月14日。

丛报》时就认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①。他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也说：

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云，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②

于是他提出了“新民说”，就是指要使中国的民众改变长久以来形成的奴性，能够自主地把握自己的生活和命运，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国民，这样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现代化才有可能实现：

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覩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者也。^③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希望通过新文化运动促使中国民众的觉悟，认为道德伦理上的觉悟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④。这就必须破除传统的宗法制度，因为：

① 梁启超：《本报告白》，《新民丛报》创刊号，1902年2月8日。

② 梁启超：《梁启超书信》，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手抄本。见梁启超：《梁启超新民说》“编序”第7页，康雪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

③ 梁启超：《梁启超新民说》，康雪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④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

宗法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残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之因。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①。

他所说的“伦理的觉悟”或“个人本位主义”，也就是他在《新青年》的创刊词中所主张的，即要使人获得解放，就必须具备的“独立自主之人格”：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决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②

在陈独秀看来，具有独立自主之人格的人，也无疑有天然的人权：

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③

而国家或社会的宗旨都在于为人们提供实际的帮助：

①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15日。

②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③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15日。

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①

胡适也不遗余力地宣扬西方式的个人主义，特别是像“易卜生主义”那样的个人自由和独立性格：

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②

为此他告诫青年人说：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③

也就是不能以牺牲个人的自由和人格为代价，去维护空洞的集体自由或集体人格，那样只会造成极权主义对奴性民众的宰制，而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和人格。所以，胡适认为一个人应该：

①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15日。

②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自序》，载于欧阳哲生编：《胡适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06页。

③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自序》，载于欧阳哲生编：《胡适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06页。

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铎曼医生。^①

梁漱溟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总结为“伦理本位的社会”，认为这样的社会相较于西方社会，缺乏个体的独立意识。他说：

在西洋既富于集团生活，所以个人人格即由此而茁露。在中国因缺乏集团生活，亦就无从映现个人问题。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为虚位。中国人却从中间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这两端好像俱非他所有）。^②

这种社会忽略掉个人的独立人格，也因此没有了以个体为成员的集团生活，而是只以家庭血缘关系为社会联结的方式，以“家族成员”的身份构成着中国式的社会生活，所以，“那我们应当说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③。

梁漱溟还把人类的文明区别为生活态度的不同，认为有西方、中国和印度三种，分别“（一）向前面要求；（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

①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自序》，载于欧阳哲生编：《胡适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05 页。

② 梁漱溟：《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载于景海峰编：《梁漱溟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3 页。

③ 梁漱溟：《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载于景海峰编：《梁漱溟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4 页。